

#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价值链攀升\*

王 静 郭劲光 程扬帆

**内容提要:**企业价值链攀升不仅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利用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冲击,采用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效应。研究发现,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链攀升,且异质性分析表明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低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强供应商关联是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助力企业价值链攀升的关键路径。此外,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改善企业成本收益状况,并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不仅从价值链视角拓展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而且能够为进一步通过企业价值链攀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价值链攀升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 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作者简介:**王 静,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116025;

郭劲光,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16025;

程扬帆(通讯作者),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3303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6-0025-16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攀升是指国家、行业或企业实现生产分工由下游环节逐渐转向上游环节,从而获取更高附加值和竞争力的过程,其结果表现为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由低端向高端移动。价值链攀升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价值链参与者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初期专注于生产成本较低的商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制结构优化与改革研究”(21&ZD09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农村相对贫困者主体性价值提升的助推机理与政策设计研究”(72274029)。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程扬帆电子邮箱:18395511810@163.com。

品,通过贸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参与者比较优势会发生动态变化,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后逐步迈向价值链更高端;二是价值链分工使得生产过程可以在不同价值链参与者之间进行,每个参与者根据自身优势承担不同生产环节,分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表明产品附加值提高,参与者的价值链位置得到跃升;三是技术创新是推动价值链攀升的关键动力,价值链参与者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开发,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向价值链高端不断攀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以及“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sup>①</sup>充分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意义。

在微观层面上,价值链攀升可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宏观层面上,价值链攀升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效拉动就业和区域经济增长。作为价值链主要的微观参与主体,企业向价值链高端位置攀升是提升经营绩效与增强竞争优势的客观要求,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当前亟待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企业价值链攀升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Chor等,2021)。企业的成长发展根植于其所处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劣水平能够深刻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如何准确认识营商环境在企业价值链攀升方面的作用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正因如此,本文选取税收营商环境这一营商环境领域的典型事实,尝试厘清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以期全面评估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社会效应、探索促进企业价值链攀升的有效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既有关于价值链位置的文献主要侧重于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在价值链位置测度方面,大多数测度方法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或中国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产业或部门的行业上游度、生产过程阶段数进行测算。倪红福等(2016)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产业部门的国内生产阶段数和国际生产阶段数。Fally(2012)根据生产阶段数概念,以递归形式定义生产与最终需求的距离为上游度。Antràs等(2012)将通过迭代计算得到的从产出到最终需求的距离定义为上游度,并论证了该上游度等同于Fally(2012)计算的上游度。鉴于上游度指标更多地反映产出供应链情况,Miller和Temurshoev(2017)基于投入需求链视角将生产部门与初始投入的距离定义为下游度。Wang等(2017)进一步在平均生产长度的核算框架下将总生产长度分解为纯国内部分、传统李嘉图部分和全球价值链部分,并重新定义上游度与下游度分别为前向生产长度与后向生产长度,提出综合利用特定部门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长度刻画价值链位置。尽管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上述方法仅适用于测度国家及行业层面的价值链位置,具体到微观企业层面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Chor等(2014)最先使用单国(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企业不同产品的出口规模占比作为权重,将各行业上游度加权至企业层面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改进了Chor等(2014)的方法,从广义增加值传递视角根据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中国企业的价值链位置并分析其结构变化。

针对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因素,可进一步细分为国家和产业两个维度。现有文献主要是从技术创新与新型技术应用(杨仁发、郑媛媛,2023)、国家双边关系(鲍晓华、卢波,2022)、贸易自由化(Aichele和Heiland,2018)、国内国际双循环(张建华等,2023)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国家或行业

<sup>①</sup>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67、471页。

价值链位置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在微观企业层面,Chor等(2021)针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与贸易经验更丰富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价值链位置。陈旭等(2022)认为,金融空间分布适度分散化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提升企业技术水平,推进企业向全球价值链更高附加值区域延伸。侯俊军等(2023)研究表明,签署数字贸易规则使得数字技术的正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继而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随着全球中间品贸易往来的大量增加,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影响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田云华等(2024)发现,公共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贸易措施与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则显著抑制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其中,与本文主题较为相关的研究是张菀洺和杨广钊(2022),该文在一般动态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下论证了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民营企业规避风险、改善盈利能力以及提升企业竞争力,较好地解释了营商环境优化对民营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与本文联系较为紧密的另一类文献是税收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关于税收营商环境的文献以理论研究居多,涵盖税收营商环境的测度评价(韩霞、于秋漫,2022)、优化路径(岳树民、张萌,2021)等方面,但并未对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进行足够关注。既有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税收征管水平、资源配置效率以及融资约束情况等视角为切入点,验证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产出、税收遵从、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就业水平等方面的积极影响。总体而言,目前税收营商环境研究范围相对有限,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纵观已有研究可知,相关文献大多聚焦国家或行业层面的价值链位置,探讨微观企业层面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鲜有研究关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尝试从产业链关联视域深入剖析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价值链位置的内在关联,丰富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以及微观企业价值链攀升理论机制领域的研究文献;(2)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创新性地采用企业销售份额与行业上游度反映行业在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与企业的产业链控制能力,构建融合中观产业与微观企业生产特征的企业价值链位置指标;(3)在研究结论上,本文不仅系统阐释了企业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实现路径,而且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现实参考。

##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一)制度背景

理论上,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营商环境是指在税收领域影响企业各种商业活动的税收政策和征管环境,其涉及税务部门对征税要素进行规定和调整,并对税收征纳进行管控的全过程。对于企业而言,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企业税收负担和涉税体验,是企业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税收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能够有效提升征管效能,形成全方位税费服务体系,从根本上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跃升的阻碍,对于企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府而言,税收营商环境是一系列税收制度安排构成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在纳税人发展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抉择与平衡,综合体现了政府在税收领域的治理能力。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透明度,加强税收执法监督和司

法保障,确保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维护税收法治秩序。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也能够增强税收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政府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从实践来看,过去十余年税务部门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税收营商环境,因此税收营商环境可以划分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层面。市场化的税收营商环境包括取消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精简涉税事项资料,集成办理税费申报,强化跨部门高效协作,建成一体化电子自助办税平台,提供精细化税费服务体验等;法治化的税收营商环境包括健全涵盖税费立法、税收征管和文件制定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规范税收执法裁量基准,创新税收稽查监管模式,推进政务与执法公开,建立意见与投诉快速响应机制,以及解决乱收费和乱罚款问题等;国际化的税收营商环境包括加强税收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治理,推进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建设,扩大和完善协定网络,建立国别税收信息研究工作机制等。在诸多政策举措中,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是税务部门认真落实国家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目标任务所推出的关键举措,旨在通过简政放权、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的路径激发与培育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其他政策相比,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坚持系统观念,采取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的方式,确保各项改革措施相互协调形成合力,从而提高改革的整体效能。

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顶层设计上,2017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江苏5省(市)获批设立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试点,试点地区出台的优化企业设立流程、改进税收优惠备案流程以及完善纳税监管体系等政策,使得企业专注于长期发展和价值增长。2018年8月《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将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浙江、江西、湖北、广西、海南、重庆、陕西、新疆、大连、宁波、厦门和青岛12省(区、市),指出要切实解决办税痛点堵点,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企业价值链攀升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后,2018年9月《全国税务系统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18年—2022年)》、2020年《关于推进纳税缴费便利化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和2021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陆续提出详细工作要求,强调加大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力度,加快税收便利化改革成果转化,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效。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立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大总体要求,积极探索了一系列便民办税的创新举措,为回答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是否促进了企业价值链攀升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 (二)理论分析

企业的价值链活动深嵌在更广泛的产业链之中,产业链关联描绘了行业内部及跨行业企业间的横向与纵向联系,为企业参与价值链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和合作网络,是企业价值实现和保值增值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通过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外部条件,不仅可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还能够促使企业与供应商联系愈加紧密,进而赋能企业价值链攀升。为此,本文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增强供应商关联两个维度阐释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效应。

### 1.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与企业价值链攀升

根据能力-动机-机会模型,自身能力、创新动机以及外部环境中的机会是微观企业主体进行技术创新决策的主要考量,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可以增强上述三方面因素,由此激励企业积极开



展技术创新活动。具体而言,首先,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所推行的简化税收法规、优化报税流程和采用电子化税务系统等措施,使得企业能够快速精准地完成涉税事项。尤其是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企业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研发中,而不是花费在烦琐的审批程序上,客观上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其次,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提高了税收管制措施的透明度和确定性,企业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税负及收益,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削弱企业开展非生产性活动的动机,有助于企业合理地安排生产规划、激发创新意愿(于文超、梁平汉,2019),进而改善企业生产效率。最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致力于提升税务服务效率,建立高效的税务服务体系,包括快速响应企业咨询、及时处理税务争议和提供定制化的税务辅导等,帮助企业解决在享受技术创新激励税收优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好地理解 and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发现更多的创新机会,从而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能够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吸收能力实现企业价值链地位攀升。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丰富企业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种类,使得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助于企业获取高额利润、提升产品附加值,帮助企业在价值链上游占据一席之地(诸竹君等,2018)。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中企业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现实情景下,技术创新提升了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允许企业充分吸收所购入的中间产品中较为先进的内嵌技术,加快企业追赶价值链高端企业技术水平的速度。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更有效地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从而策略性地提高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这无疑起到了增强生产效率、支持企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陈南旭、王林涛,2022)。简言之,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效应得以实现。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提高生产效率助力企业价值链攀升。

## 2.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供应商关联与企业价值链攀升

增强供应商关联是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影响企业价值链攀升的另一重要机制。从缓解融资约束角度分析,税务机关所提供的便捷的纳税服务、透明的税收政策和及时的税收指导能够避免企业因遵从烦琐的税务流程而挤占流动资金,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也可以通过“银税互动”项目将企业的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拓宽企业外源融资渠道。融资约束缓解使得企业能够减少贸易往来过程中的延迟支付,提高其在供应商中的信誉,增强供应商对企业的信任和合作意愿,有助于维系企业与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深化企业与供应商的关联程度(Bauer等,2018)。从降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规范了税收监管裁量基准,显著提高了对企业违规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克服企业与供应商间潜在的机会主义倾向,促进企业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税务部门也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将供应商的税务信息、信用状况等开放给采购方,帮助企业准确了解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稳定性、提升企业间的信息对称程度,从而增进企业与供应商间的信任度和关联度(Hendricks和Singhal,2005)。

供应商关联是影响企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与供应商紧密的关联关系能够助力企业实现价值链攀升。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供应商关联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关键抓手。即使在发生严峻的外部风险冲击时,拥有更高供应商关联性的企业仍能与供应商保持密切的贸易联系,协同合作避免产业链断链风险,从而稳定企业生产经营预期,保证企业能够持续高效地进行生产活动,为扩大生产规模与提升产品质量奠定坚实基础,进而支撑企业向更

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迈进(陶锋等,2023)。另一方面,通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可以获得更优惠的采购价格和条件,如采购折扣、灵活的付款方式等,从而降低采购成本;紧密的供应商关系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共享销售数据和需求预测信息,实现更精确的库存管理,减少库存积压和过剩的风险。最后,供应商关联是企业贸易结构改善的前提。企业与供应商关联程度的深化意味着企业增加了与价值链高端企业的贸易往来,有利于促进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协同和信息共享,使得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更加高效,减少了不必要的等待和协调时间,推动企业与价值链高端企业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促使企业贸易结构中价值链高端产品的比重上升,进而推动企业逐步攀升至价值链高端位置(Melitz 和 Ottaviano, 2008)。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通过增强供应商关联助力企业价值链攀升。

### 三、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方面,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价值链数据基于2010—2020年的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求得,地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企业数据;(2)剔除上市状态为ST、\*ST和终止上市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4)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8796条“企业—年度”观测值。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以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攀升。由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政策在时间和地区两个层面上存在差异,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识别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效应,如模型(1)所示:

$$VC_{ipt} = \alpha_0 + \alpha_1 Reform_{ipt} + \alpha_2 Controls_{ip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pt} \quad (1)$$

其中,下标*i*表示企业,*p*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VC_{ipt}$ 代表企业价值链位置;核心解释变量 $Reform_{ipt}$ 为企业*i*所在地区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否开展试点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i*所在地区在第*t*年及之后年份开展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Controls_{ipt}$ 为控制变量集合,具体见下文; $u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lambda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pt}$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将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在考虑中观产业特征的基础上,将其与微观企业生产特征相结合,从而构建能够反映企业价值链位置的综合性指标。在行业层面,行业上游度是企业所处行业与最终需求端的距离,行业上游度值越大,表明该行业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越高。本文借鉴Antràs等(2012)、Chor等(2021)的研究,利用OECD投入产出表和Zheng等(2018)提供的矩阵转换技术得到的2010—2020年中国时序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行业产品与最终需求的加权平均距离衡量行业上游度,具体过程为,首先考虑一个由*N*个行业组成的封闭经济体,对于任一行业*i*,总产值 $Y_i$ 等于该行业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 $F_i$ 和用于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部分 $Z_i$ 之和,即:

$$Y_i = F_i + Z_i = F_i + \sum_{j=1}^N \alpha_{ij} Y_j \quad (2)$$

式(2)中,  $\alpha_{ij}$  为直接消耗系数, 表示生产 1 单位价值的  $j$  所使用的  $i$  行业的产值。对  $Y_j$  进行上述恒等式迭代, 对等式右边每个生产阶段赋予等长度权重, 每一生产阶段距最终使用的距离加 1, 并在等式两边同除以行业  $i$  的总产值  $Y_i$ 。行业  $i$  在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 即行业上游度 ( $Up_i$ ) 可表示为:

$$Up_i = 1 \times \frac{F_i}{Y_i} + 2 \times \frac{\sum_{j=1}^N \alpha_{ij} F_j}{Y_i} + 3 \times \frac{\sum_{j=1}^N \alpha_{ik} \alpha_{kj} F_j}{Y_i} + 4 \times \frac{\sum_{j=1}^N \alpha_{il} \alpha_{lk} \alpha_{kj} F_j}{Y_i} + \dots \quad (3)$$

在微观企业层面, 企业的销售份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行业势力和产业链控制能力, 企业销售份额提升说明企业价值链增值能力变强, 价值链地位得到升级 (De Loecker 等, 2020)。为从行业与企业两个层面精准刻画企业的价值链位置, 本文以企业营业收入 ( $Sales_j$ ) 与同行业营业收入前三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 ( $Sales_i$ ) 的比值作为权重将行业上游度指数加权至企业层面得到企业营业上游度:

$$VC_{fi} = \frac{Sales_f}{Sales_i} \times Up_i \quad (4)$$

式(4)中,  $f$  代表行业  $i$  内的企业。由于行业上游度的值大于等于 1, 营业收入权重大于 0 且小于 1, 不难看出企业营业上游度值越大, 企业价值链位置越靠前, 企业的行业势力和影响力越强。综上所述, 本文以企业营业上游度 ( $VC_{fi}$ ) 作为微观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此外, Fally (2012) 构建了行业生产阶段数指标来度量企业所处价值链的位置, 生产阶段数指标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环节多寡, 刻画了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 生产复杂程度越高代表企业的价值增值能力越强。本文同样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行业生产阶段数作为对行业上游度的替代性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以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指标 ( $Reform$ )。当企业所在地区当年及之后为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地区时,  $Reform$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 Chor 等 (2021)、倪红福和王海成 (2022) 的研究, 选取以下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 $size$ ), 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 企业年龄 ( $age$ ), 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加 1 的自然对数衡量; 资产负债率 ( $lev$ ), 采用企业负债总计与资产总计的比值衡量; 人均工资水平 ( $wage$ ), 采用企业人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资本密集度 ( $cap$ ), 采用企业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 企业所有制 ( $soe$ ), 如果企业属于国有企业, 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此外, 选取地区省份层面变量加以控制: 经济发展水平 ( $gdp$ ), 采用省份实际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 产业结构 ( $industry$ ), 采用省份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 金融发展水平 ( $finance$ ), 采用存贷款之和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 对外开放水平 ( $open$ ), 采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政府干预 ( $govern$ ), 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基于式(1)的估计结果。本文在基准回归过程中始终控制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其中,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列为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列为同时加入企业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Reform* 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代表的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 1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企业价值链位置 (VC)		
	(1)	(2)	(3)
<i>Reform</i>	0.031*** (0.007)	0.028*** (0.007)	0.031*** (0.007)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地区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8796	28796	28796
R <sup>2</sup>	0.801	0.818	0.818

注:(1)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2)\*\*\*、\*\*和\*分别代表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同;(3)下文企业控制变量和地区控制变量统称为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统称为固定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sup>①</sup>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以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前一年作为基期,构建不同年份的虚拟变量 *T* 对模型(1)中的 *Reform* 进行替换, *k* 取值为0代表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实施当期, *k* 取负(正)值代表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前(后)的期数,如模型(5)所示:

$$VC_{ipt} = \alpha + \sum_{k=-8}^3 \alpha_k T_k + \alpha_4 Controls_{ip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pt} \tag{5}$$

估计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8期~前2期的估计系数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即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之间价值链位置的变化趋势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随机抽取部分样本企业作为处理组,将其余样本企业作为控制组,重新估计模型(1)。将以上随机抽样的过程重复500次,绘制其 *Reform* 项估计系数分布图。结果表明, *Reform* 系数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且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0.031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

<sup>①</sup> 由于篇幅限制,文中未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线上附录。



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并非由随机性因素造成的。

### 3. PSM-DID 与熵平衡

本文采取 PSM 法与熵平衡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再重新进行回归。无论是基于 PSM-DID 还是熵平衡法得到的结果均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链攀升,佐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 4. Goodman-Bacon 分解

由于各试点地区开展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时间存在差异,双重差分设计下的固定效应模型(TWFE)估计值是四组  $2 \times 2$ -DID 的加权估计结果,其中以较早接受处理的样本作为后接受处理样本的对照组的  $2 \times 2$ -DID 处理效应估计系数被纳入加权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即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Sun 和 Abraham, 2021)。本文基于 Goodman-Bacon(2021)所提出的 TWFE 估计值分解的思路检验多期 DID 的异质性处理效应,发现结果较为稳健。

### 5. 更换双重差分估计方法

为进一步缓解异质性处理效应对多期 DID 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 Callaway 和 Sant' Anna(2021)的做法,通过计算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应再加权加总,进而获取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结果显示,采用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结果一致,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链攀升。

### 6. 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首先,借鉴倪红福等(2016)的研究,采用生产阶段数衡量上游度指标,重新构建企业价值链位置指标( $VC\_psl$ ), $VC\_psl$  增大说明企业价值链攀升;其次,计算企业与前五大客户平均营业上游度的距离( $VC\_cus$ )和企业与前五大供应商平均营业上游度的距离( $VC\_sup$ ), $VC\_cus$  越大或  $VC\_sup$  越小说明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越高。估计结果表明,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不同测度方式不会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 7. 排除遗漏变量问题

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纳入以下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两职合一( $ceodua$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 1,否则为 0;股权集中度( $top10$ ),采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与期末总股数之比衡量;四大审计( $big4$ ),公司经由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审计取值为 1,否则为 0。在排除遗漏变量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

### 8. 排除样本选择问题

为排除潜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首先,2010—2020 年的其他政策或外生冲击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干扰,本文将样本区间分别调整为 2015—2020 年以及 2010—2019 年进行估计;其次,本文将计划单列市的样本剔除后重新回归。在排除样本选择问题后, $Reform$  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证实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 9. 更换聚类方式

在这一部分,本文收紧聚类层级条件,将估计系数的聚类层级分别提升到行业与省份层面。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更换聚类方式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 10.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本部分主要内容包括:(1)为排除自贸区政策、知识产权示范政策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影响,本文将企业所在地区是否被纳入自贸区试点范围的虚拟变量( $FTZ$ )、知识产权示范政策试点的

虚拟变量(*IPR*)、企业增值税负担(*tburden*)分别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2)为排除留抵退税政策、“营改增”政策的可能干扰,本文参考张克中等(2020)的做法,分别剔除受留抵退税政策影响最大的企业样本、受“营改增”政策影响最大的企业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3)为排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本文构造企业当年是否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虚拟变量(*depreciation*)加入基准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结论并未发生改变。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1. 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机制检验

根据研究假说,本文参考蒋殿春和卜文超(2023)的做法,选取企业研发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rd*)、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inv*)、利用O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OP*)、利用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LP*)、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和存货周转率(*Inve*)作为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变量,对滞后一期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表2列出了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Reform*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通过了5%或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确实能够促进企业提升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即验证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假说1成立。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生产效率关系到企业在专业化分工中的话语权,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将转化为科技成果的开发应用,从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与技术含量,带来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

表 2 机制检验: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						
变量名称	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					
	(1)	(2)	(3)	(4)	(5)	(6)
	<i>rd</i>	<i>inv</i>	<i>TFP_OP</i>	<i>TFP_LP</i>	<i>Rece</i>	<i>Inve</i>
<i>Reform</i>	0.061** (0.028)	0.057** (0.028)	0.033** (0.015)	0.055*** (0.015)	0.093*** (0.036)	0.030** (0.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601	23610	21496	21496	24292	24095
R <sup>2</sup>	0.879	0.788	0.881	0.913	0.671	0.761

2. 供应商关联的机制检验

参考范子英和彭飞(2017)、张虎等(2023)的研究,本文计算了供应商关联的四类指标(*CYL\_back*、*CYL\_back\_psl*、*linkage*、*linkage\_psl*),<sup>①</sup>将其对核心解释变量做回归,得到供应商关联机制检验结果表3。可以看出,*Reform*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伴随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逐步实施,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目标企业的供应商关联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确认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强化企业供应商关联的判断,假说2得证。供应商关联程度的上升不仅有助于企业妥善

① 供应商关联指标的详细计算过程列于线上附录中。

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稳定生产经营预期,还会促进企业贸易结构的优化,增加其与价值链高端企业的贸易往来,最终实现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

变量名称	企业供应商关联			
	(1)	(2)	(3)	(4)
	<i>CYL_back</i>	<i>CYL_back_psl</i>	<i>linkage</i>	<i>linkage_psl</i>
<i>Reform</i>	0.106** (0.053)	0.262** (0.114)	0.056*** (0.021)	0.080** (0.0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104	3104	25504	25504
R <sup>2</sup>	0.731	0.777	0.715	0.818

(二)异质性分析<sup>①</sup>

1. 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较高的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的前期投资与研发活动,限制企业参与更高级别的供应链合作,导致企业错失扩张市场份额和推动品牌高端化的良机,延缓或阻碍企业向价值链上游迁移,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能够迅速把握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机会,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转化为企业价值链攀升的动力。因此,本文预期对于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而言,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应更明显。参考 Hadlock 和 Pierce(2010)的研究,本文以 SA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将大于中位数的企业样本划分为融资约束大组,反之则为融资约束小组。回归结果显示,在融资约束较小的样本中 *Reform* 的回归系数更大,即企业融资约束越小,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 企业治理水平

一般而言,相较于具有良好治理水平的企业,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难以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企业价值链攀升面临较大阻力。可以预期,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刺激企业提升治理水平以适应更加规范透明的市场要求,治理水平较低企业对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其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参考周茜等(2020)的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监督、激励、决策等方面构造综合指标测度公司治理水平,将大于中位数的样本划分为企业治理水平高组,其余划分为企业治理水平低组。研究表明,*Reform*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在企业治理水平低组中值更大,证实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治理能力较弱的企业产生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

3. 地区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企业需要积极增强竞争力,以更优的资源配置与内部管理对冲挑战,主动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反之,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推高企业的交易成本,迫使企业付出额外代价以获取资源支持,致使企业陷入发展困境,难以提升价值链位置。因此,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可能因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而存在不同。根据估计结果可得,仅市场化程度低组的 *Refor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市场

① 由于篇幅限制,文中未列出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详见线上附录。

化程度低的地区中企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更强。

4. 行业差异

与制造业不同,非制造业通常更侧重于知识等非物质资源要素的投入,这与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向较为契合。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降低非制造业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使非制造业企业从税收优惠政策中受益。据此推断,相较于制造业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背景下更容易实现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样本 *Reform*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非制造业企业样本中 *Reform* 的估计系数更大,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非制造业企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

六、进一步分析

上文系统分析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影响,证明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积极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考察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成本收益的关系以及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

(一)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成本收益

为分析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是否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本文参考石大千等(2020)的研究,采用企业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测度企业管理费用率(*cost1*),采用企业销售期间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测度企业销售期间费用率(*cost2*),将其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表 4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成本收益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企业成本收益	
	(1)	(2)
	<i>cost1</i>	<i>cost2</i>
<i>Reform</i>	-0.004** (0.002)	-0.006**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8714	28714
R <sup>2</sup>	0.811	0.825

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管理费用率还是企业销售期间费用率,*Reform* 的估计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改善了企业成本收益情况,即企业能利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契机实现成本收益的有效管理。原因在于:一方面,税收营商环境优化通过简化涉税业务流程、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和提供精准高效的税务服务,直接降低企业在遵守税收法规和办理税务手续时所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防止高企的交易成本挤占企业现金流,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成本收益状况;另一方面,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稳定企业发展预期,减少企业因税收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和风险,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地区资源集聚水平,显著增强企业盈利能



力、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二)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

为进一步分析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本文借鉴魏龙和王磊(2017)的做法,以企业出口占行业总出口的份额为权重对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的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进行加权平均,构建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GVC1与GVC2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列于表5。表5中Reform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本文认为:(1)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的空间布局,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吸引中高端生产阶段流入本地区,通过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区位配置降低生产要素配置的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有效吸纳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2)创新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因素,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贸易条件,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从而提高企业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企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向上攀升。

表 5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1)	(2)
	GVC1	GVC2
Reform	0.003* (0.002)	0.001* (0.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5771	15771
R <sup>2</sup>	0.768	0.774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分批次试点的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1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深入考察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链攀升,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会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增强企业供应商关联,进而促进企业价值链攀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水平较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中,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价值链攀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此外,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有效改善了企业的成本收益状况,亦能助推企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首先,持续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有必要在现有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基础上出台更具实效的政策举措。在实践中,应大力

推广电子税务局平台,扩大“非接触式”办税范围,精简办税流程和申报材料,自动推送提示与预填信息。税务部门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及时主动发布税收政策信息与税务部门新闻,加强对税收政策的宣传解读,与纳税人就税收政策与税务活动细则进行沟通交流,确保各类企业能够自觉遵守税收法规,保障企业了解并及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此外,也应加强不同地区间的交流合作,构建以各级政府主导的税收协同机制,形成全方位的地区间税收合作架构,妥善解决跨地区税收争议,营造地区间信息协调共享的税收营商环境。

其次,探索促进技术创新和提升供应商关联的实现路径,赋能企业价值链攀升。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可以探索定向提供与技术创新相关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教育培训等激励措施,同时注重叠加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取向一致性,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此外,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和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对供应链企业进行定期评估和检查,收集和发布与供应链有关的信息,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响应速度,鼓励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最后,精准实施差异化的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政策,因地制宜提升政策效应。在推进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同时,应有针对性地给予各种类型企业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例如,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在国内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特点,打造差异化的税收营商环境,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较低但潜力大的行业,需要把加快改革红利兑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向市场主体释放坚定的改革决心。再如,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在设计改革措施时可以考虑在税收方面给予更多的便利和优惠,更好地适配本地的产业特色与经济发展情况,从而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 参考文献:

1. 鲍晓华、卢波:《政治互信能否促进务实合作: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财经研究》2022年第4期。
2. 陈南旭、王林涛:《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进程中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的交互贡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3. 陈旭、邱斌、张群、张亮:《金融空间分布与企业全球生产链嵌入》,《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4. 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5. 韩霞、于秋漫:《聚类分析视角下税收营商环境国际比较及评价》,《税务研究》2022年第12期。
6. 侯俊军、王胤丹、王振国:《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4期。
7. 蒋殿春、卜文超:《反垄断法与中国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不同市场地位企业的微观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8. 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管理世界》2016年第4期。
9. 倪红福、王海成:《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10. 石大千、李格、刘建江:《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TFP——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财贸经济》2020年第3期。
11. 陶锋、王欣然、徐扬、朱盼:《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
12. 田云华、周燕萍、张支南:《中间投入非关税措施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24年第5期。
13. 魏龙、王磊:《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6期。
14. 杨仁发、郑媛媛:《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及韧性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15. 于文超、梁平汉:《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1期。
16. 岳树民、张萌:《优化我国税收营商环境的借鉴与路径选择》,《税务研究》2021年第2期。
17. 张虎、高子恒、韩爱华:《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5期。

18. 张建华、赵英、刘慧玲：《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9期。
19.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20. 张菡沼、杨广钊：《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财贸经济》2022年第10期。
21. 周茜、许晓芳、陆正飞：《去杠杆，究竟谁更积极与稳妥？》，《管理世界》2020年第8期。
22. 诸竹君、黄先海、余骁：《进口中间品质量、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8期。
23. Aichele, R., & Heiland, I., Where Is the Value Adde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15, 2018, pp.130-144.
24. Antràs, P., Chor, D., Fally, T., & Hillberry, R.,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2, No.3, 2012, pp.412-416.
25. Bauer, A. M., Henderson, D., & Lynch, D. P., Supplier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the Duration of Custom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93, No.3, 2018, pp.59-82.
26. Callaway, B., & Sant'Anna, P. H. 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225, No.2, 2021, pp.200-230.
27. Chor, D., Manova, K., & Yu, Z., Growing Like Ch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30, 2021, 103445.
28. Chor, D., Manova, K., & Yu, Z., The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of Chinese Firms. NBER Working Paper, 2014.
29. De Loecker, J., Eeckhout, J., & Unger, G., The Rise of Market Power and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5, No.2, 2020, pp.561-644.
30. Fally, T.,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U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Mimeo, 2012.
31. Goodman-Baco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225, No.2, 2021, pp.254-277.
32. Hadlock, C. J., &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3, No.5, 2010, pp.1909-1940.
33. Hendricks, K. B., & Singhal, V. R., Association Between Supply Chain Glitches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cience*, Vol.51, No.5, 2005, pp.695-711.
34. Melitz, M. J., & Ottaviano, G. I. P.,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5, No.1, 2008, pp.295-316.
35. Miller, R. E., & Temurshoev, U., Output Upstreamness and Input Downstreamness of Industries/Countries in World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Vol.40, No.5, 2017, pp.443-475.
36. Sun, L., & Abraham, S., Estimating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in Event Studie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225, No.2, 2021, pp.175-199.
37. Wang, Z., Wei, S. J., Yu, X., & Zhu, K.,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NBER Working Paper, 2017.
38. Zheng, H., Fang, Q., Wang, C., Jiang, Y., & Ren, R., Updating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Series Using MTT Method and its Comparison. *Economic Modelling*, Vol.74, 2018, pp.186-193.

## Optimizing the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Facilit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WANG Jing, GUO Jingua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16025)

CHENG Yangfa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33030)

**Summary:** Ami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o bolster the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has become imperative,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is also cr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facilitating corpor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rea of concern for socie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on corpor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tax reforms and for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for corpor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This study leverages the exogenous policy shock from the pilot reform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in China’s tax system. Using listed firm data from 2010 to 2020,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is constructed fo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facing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firms with weaker corporate governance, firms located in less market-developed regions, and non-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dentifies three key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drives corpor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hanc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ing supplier linkages. Moreover, such optimization improves firms’ cost-benefit perform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ing.

This paper makes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nd firm-level value chain upgrading. Second, in terms of research indicators, this paper employs firms’ sales share and industry upstreamness to reflect their relative position in the value chain and their control over the industrial chain, constructing a value chain position indicator that captures firm-level characteristics. Third, in terms of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firms achieve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provides rigorou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valuating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reform in the tax system.

This study yields three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reform in the tax system and implement more effective policy measure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intergovernmental tax cooperation framework. Second, policymakers should explore pathway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hance supplier linkages to empower corporate value chain upgrading and prioritize policy coherence in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to enhanc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s. Thi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policies in the tax system, tailoring measures to local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Place-based adaptations are crucial for policy effectiveness.

**Keywords:** Value Chain Upgrading,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Upgrading Services” in the Tax System

**JEL:** H20, H32, D21

责任编辑: 馨 蘭